

比较

NO.3, 2012

60

COMPARATIVE STUDIES

吴敬琏 主编

许成钢

科举制与基督教会 对制度演变的影响

蒂莫西·贝斯利

新政治经济学

考希克·巴苏

全球化时代印度政策制定的两难困境

马克·卡尼

去杠杆化时代的经济增长

蒂莫西·基欧 费莉佩·梅萨

墨西哥追赶型增长后的停滞

何东 张丽玲 张文朗 胡东安

资本账户开放的双向影响

黄小虎

改革政府经营土地制度

理查德·施拉格尔

民主与债务

江飞涛 李晓萍

产业政策的再思考

比较

No.3, 2012

C O M P A R A T I V E S T U D I E S

60

吴敬琏 主编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比较 .60 / 吴敬琏主编.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2.6

ISBN 978-7-5086-3356-5

I. 比… II. 吴… III. 比较经济学 IV. F06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95949 号

比较·第六十辑

主 编: 吴敬琏

策 划 者: 《比较》编辑室

出 版 者: 中信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中信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财新传媒有限公司

承 印 者: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2.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86-3356-5/F · 2634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400-696-0110

<http://www.caing.com>

010-58103380

E-mail: service@caixinmedia.com

比较

COMPARATIVE STUDIES

主管 中信集团

主办 中信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中信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主编 吴敬琏

副主编 肖梦 吴素萍

编辑部主任 孟凡玲

编辑 包敏丹

封面设计 李晓军 / 美编 杨爱华

经营部

总经理 吴传晖（兼）

总经理助理 黄易

商务拓展总监 王正

华北销售总监 宋洋 / 客户总监 胡蓉 田野

华东销售总监 王海瑾

华南客户总监 苏丽衡

市场总监 金楠

发行总监 邱道姗

整合营销总监 周轶

设计总监 石乐凯

品牌传播总监 马玲

独家代理：财新传媒有限公司

电话：(8610) 85905000 传真：(8610) 85905288

广告热线：(8610) 85905088 85905099 传真：(8610) 85905101

电邮：ad@caixinmedia.com

订阅及客服热线：400-696-0110 (8610) 58103380 传真：(8610) 85905190

香港地区订阅热线：(00852) 21726522

订阅电邮：circ@caixinmedia.com 客服电邮：service@caixinmedia.com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西大望路1号温特莱中心A座16层（邮编：100026）

卷首语

《比较》第60辑的出版，恰逢10周年。过去10年，《比较》始终努力地企图搭建一个经济学专业的交流平台，“以比较传递思想、理念和智识”作为我们的宗旨。浏览和翻阅过往的《比较》会生出许多感慨。“前沿”栏目一直跟踪发表世界级学者前瞻性的研究成果和文献，特别的是，《比较》是国内唯一刊登2001年以来各位诺奖得主的颁奖演讲稿，且获得诺贝尔奖委员会授权的出版物；十年前，在安然危机爆发时，我们第一时间介绍了国内外学者对危机的剖析和解读；在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后，我们又迅速跟踪经济学界、政策界、金融业界对危机的讨论、反思，对金融监管体制的探讨，对美国新金融监管方案的解读，作者既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也有监管机构的高层；“法和经济学”栏目发表了大量该领域的研究文献，如公司治理、法和金融等等；“比较制度分析”和“比较之窗”刊发的诸多文章，则关注制度问题和各国的政策实践，特别是有针对性的涉及法治的市场经济体制、政府与市场的角色，转型中的改革顺序选择等；“专题”栏目集中提供对经济生活中不同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的分析与见解，如媒体、社保、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等等。经济学常常被批评“有帝国主义倾向”。但这样的批评，某种程度上恰恰反映了轻视甚或敌视专业主义的倾向。改革经常是在“循环往复”中前行与退缩，实践远远没有从经济学提供的理论框架和基准中汲取充分的养料，虽然经济学家的许多预言都一一得到了验证，然而经济学提供的很多认识和见解，却没有被现实的政策实践所接纳。无论是我们过去的成功改革经验，还是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都表明，严谨一致的经济理论分析是一个发展中的、转型中的国家有利且强大的政策工具，它能让我们看到问题的关键所在，并提供前瞻性、预见性和操作性。

让我们看看经济学家如何在当前的全球困顿中，讨论经济学的使命的。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家教授贝斯利是当代新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代表人物，他的文章概述了新政治经济学这一经济学研究的新领域。他说，当前新政治经济学的兴起是经济学家为了应对三个挑战：第一是，90年代苏联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第二，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为选择好政策提供激励并确保它们得到实施至关重要；第三，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对更详细正式的政府模型提出了要求。因此，贝斯利开宗明义地指出，新政治经济学并非经济学帝国主义，而是在经济学家有比较优势的场合，研究政策制定的制度成因，为重要的政策问

题提供新的见解,从而扩展经济政策分析的领域,提高经济政策分析的实用性。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理解新政治经济学的含义,贝斯利回顾了政治经济学的学科谱系,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到比较社会体制到公共选择和民主的经济分析,再到新政治经济学。他还利用具体例子,说明了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和思路。

许成钢一直致力于研究制度与经济发展,最近他打算从制度演进的视角,用一系列文章来讨论宪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国历史上宪政改革失败的主要因素。《科举制与基督教会对于制度演变的影响》就是这一系列文章的第一篇。许成钢认为,从历史和国际比较来看,宪政是一个社会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而中国历史上的宪政改革之所以失败,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科举制。为此,他比较分析了科举制和基督教会的基本制度特点和激励机制,以及这两个制度与相对应的中国帝制及罗马帝制的不同关系。科举制在本质上是帝制的人事制度和教化工具的核心,完全不具有独立性;基督教会虽与罗马帝国关系密切,但始终作为一个独立体存在。科举制提供了强大的现世激励回报,使社会中的知识分子失去独立性和信仰;相比之下,基督教会的来世回报则是较弱的激励机制。由于基督教会的非世俗特点和“上帝高于皇帝”的认识,教会中出现了独立的学术研究机构和非世俗追求的知识分子,他们之后成为欧洲启蒙运动的重要推动力量。而在科举制的思想束缚下,中国的知识分子很难冲破“皇权至上”的世俗追求,跨出独立思考的一步。正是这种不同的制度安排和由此形成的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导致了后来西方宪政改革的成功和中国历史上宪政改革的失败。

“比较之窗”是康奈尔大学经济学教授、印度政府首席经济顾问巴苏谈印度的文章,让我们得以一窥印度的经济概貌和面临的政策挑战。巴苏认为,印度经济目前的高增长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三个阶段:始于1975年的第一波增长,1993年开始的第二波增长主要源于20世纪90年代早期围绕对外经济部门的经济改革,始于21世纪初的第三波经济增长。在谈到不同增长阶段的主要推动因素时,巴苏特别说明了文化和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因为经济就植根于这些制度之中。文章还运用简单的模型,着重分析了全球化背景下,包括印度在内的许多穷国可能面临的政策困境——贫困和不平等之间的权衡取舍。巴苏提出了一个解决这一困境的务实方法:五分位原则,即关注20%社会最底层人口的收入增长,这意味着,在有些时候,我们需要容忍一定的不平等,不是为了实现高增长,而是为了减少一些贫困。同时,还要加强国际间的政策协调,因为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一个国家的政策是否“正确”,完全取决于其他国家是否采取了相似的政策。印度应该利用其不断提升的全球地位发起国际政策协调的尝试。

加拿大央行行长马克·卡尼在《去杠杆化时代的经济增长》一文中,对经济史上的债务周期进行了梳理、对去杠杆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他指出,当前加拿大去杠杆化所面临的挑战与一个世纪以前大有不同,“在过去,人口结构和生产能力发展的趋势较今天更良好;我们是在全球经济强劲增长的背景下实施去杠杆化;汇率也可以作为有效减震器,帮助建立当前只能通过生产率提高才能提升的竞争力”。当前,加拿大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生产率增长业已放缓、全球竞相去杠杆化,如果仍想靠超额消费来维持增长,最后将不得不作出痛苦的调整。

1950年,墨西哥经济进入起飞阶段,并快速增长了30多年。但是,此后

的墨西哥经济一直趋于停滞不前。基欧和梅萨的文章表明，墨西哥的进口替代增长保护了国内垄断，抑制了国内创新，导致经济中充斥着大量的低效率，随着起飞阶段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放缓，经济也就失去了可持续增长的动力，滑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墨西哥的经历表明，开放从来具有正面意义，而非负面意义。对中国来说，也许这就是墨西哥给我们的教训。

在《资本账户开放的双向影响》一文中，香港金管局何东等人基于国际经验和对中国经济前景的判断，研究资本流动的决定因素，预测今后十年中国国际投资头寸的变化，及其对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影响。文章假设到2020年，中国已大致实现人民币资本账户可兑换，与中国人民银行最近建议的时间表相符。经研究发现，中国国际投资头寸将显著增加，资本流入和流出将变得更加平衡。私人部门将从净负债状态转变为小规模净资产状态，而公共部门的净资产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而言将大幅下降。由于私人部门的国外债权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外汇储备的重要性减少，中国将能够从国外赚取更高的净投资收入。总体而言，中国将继续是一个净债权国，而到2020年净国外资产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将大致维持稳定。这些结果表明，因为资本流动将双向增长，人民币实际汇率将不会对资本账户开放十分敏感。

黄小虎长期从事土地制度研究，他在《改革政府经营土地制度的时机已经成熟》一文中指出，政府经营土地制度，在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对城市土地市场化改革，曾经发挥过正面的推动作用；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浪潮中，政府经营土地也有积极的贡献。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弊端日益突显，如阻碍保护耕地政策的落实，与民争利导致分配不公，土地财政、土地金融导致金融风险积聚，等等。他认为，现在对这一制度进行改革的物质条件已经具备，改革的案例与经验已有相当的积累，中央关于改革的指导思想也已经十分明确，因此应适时推出根本性的改革措施，不能再拖。他还提出了一些相应的改革措施：如土地管理与经营职能的分离；按法律规定，禁止政府以土地抵押或质押融资的违法行为；把“软约束”规划变成“硬约束”规划。

最近美国州与市政府的财政危机引起了多方的恐慌，也引起了学者对救助和其他缓解债务手段的热烈争论。为什么本应事前控制州与市政府财政行为的机制（财政宪法和市场）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债务与民主》一文对19世纪州与市政府债务危机后出台的解决办法进行了梳理，并指出，财政宪法和市场不但未能预防州与地方的财政困境，反而束缚了州与地方政府对经济商业周期作出反应的能力。解决州与地方财政危机很大程度上是政治问题，而不是制度设计问题。

21世纪以来，中国产业政策进一步强化了行政性干预措施的运用，体现出强烈的直接干预市场的特征。然而，大量研究文献表明，以直接干预市场为特征的选择性产业政策，无论其理论依据还是实施效果都受到广泛的质疑。江飞涛等人的文章归纳梳理了产业政策领域的研究文献，对产业政策的传统理论基础，如市场失灵、战略性贸易理论进行了反思。他们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存在的所谓“市场失灵”，实则多是“政府失灵”或“制度失灵”，实施直接干预市场型的产业政策只会使问题更为严重。中国未来的产业政策应当以维护市场竞争、增进市场机能与扩展市场范围作为基本取向，以此促进产业与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目 录

Contents

第六十辑

- 1 新政治经济学 蒂莫西·贝斯利
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 *by Timothy Besley*

比较制度分析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

- 26 科举制与基督教会
对制度演变的影响：宪政与宗教文化制度
许成钢
Constitutionalism and Religious/Culture Institutions: Impacts of
Imperial Examinations and Christian Church
by Chenggang Xu

海外特稿

Special Feature

40 印度的困境：全球化世界中政策制定的政治经济学

考希克·巴苏

India's Dilemma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licy-Making in a
Globalized World

by Kaushik Basu

金融论坛

Financial Forum

62 去杠杆化时代的经济增长

马克·卡尼

Growth in the Age of Deleveraging

by Mark Carney

比较之窗

Comparative Studies

76 追赶型增长后的经济停滞：1950~2010年的墨西哥

蒂莫西·基欧 费莉佩·梅萨

Catch-up Growth Followed by Stagnation: Mexico, 1950-2010

by Timothy J. Kehoe and Felipe Meza

改革论坛

Reform Forum

110 资本账户开放的双向影响

何东 张丽玲 张文朗 胡东安

How Would Capital Account Liberalization Affect China's Capital
Flows and the Renminbi Real Exchange Rates?

by Dong He, Liling Zhang, Wenlang Zhang and Dong'an Hu

137 改革政府经营土地制度的时机已经成熟

黄小虎

It's Time to Reform Government-run Land System

by Xiaohu Huang

法和经济学

Law and Economics

150 民主与债务

理查德·施拉格尔

Democracy and Debt

by Richard Schragger

政策评论

Policy Review

174 干预市场抑或增进与扩展市场：产业政策中的问题、争论及理论重构

李晓萍 江飞涛

Market Failure and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Literature Review and

Future Research

by Xiaoping Li and Feitao Jiang

新政治经济学

蒂莫西·贝斯利

1. 引言

很荣幸有机会做今年的凯恩斯讲座。我选讲的题目是新政治经济学，过去 15 年来在经济学和政治学交叉领域涌现出大量的研究和思考。新政治经济学一定程度上扭转了 19 世纪末经济学和政治学相分离的趋势。

新政治经济学旨在解释政策领域出现的重大问题。正如经济学家时不时地指出，它并不意味着经济学入侵政治学。相反，新政治经济学的关注重点在于如何扩展经济学家分析问题的能力，而这些问题必须借助一些与经济和政治决策有关的工具。

本讲座绝不是对新政治经济学的综述，无论是讨论新政治经济学研究背后的动因，还是探讨与文献相关的一些关键主题，都带有很强的选择性和个人观点。因此，本讲座是一篇抛砖引玉之作，希望初次接触新政治经济学思想的人能认真钻研文献，作出自己的贡献。

* Timothy Besley, 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和政治学教授。本文根据作者 2004 年 10 月在英国社会科学院的凯恩斯讲座整理而成。作者从 Pete Boettke、Mary Morgan 和 Torsten Persson 等人的早期评论中受益匪浅，Steve Coate 也给了大量富有启发性的建议。该领域有时也被称为政治经济学 (Political Economics)，参见 Alt 和 Crystal (1983)，以及 Persson 和 Tabellini (2000)。

2. 为什么是现在？

回顾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那时，主流经济学对政治经济问题的兴趣并不大。尽管芝加哥大学和弗吉尼亚大学等学校是例外，但发表在顶级主流经济学期刊上的研究论文并不多。政策经济学（Policy economics）仍由庇古范式（Pigouvian paradigm）占主导，庇古范式以市场失灵概念为基础，提出了最优干预概念。阿特金森和斯蒂格利茨（Atkinson 和 Stiglitz, 1980）的里程碑著作，对一整代政策经济学者的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借助于社会福利函数概念，两位作者严谨地说明了效率和公平之间的权衡取舍（efficiency-equity trade-offs）。书中文献多偏重于技术分析，主要聚焦于最优政策问题，很少注意制度设计和政策实施。

但 20 年后，学术界和整个世界的情形已经大不相同。1990 年之前，整个世界被分成了两种相互竞争的经济体制：一种是主要在东欧地区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另一种是盛行于世界其他地区的混合经济体制。最终，社会主义经济试验归于失败，不得不让位给一种二维共识（two-dimensional consensus）。

第一个维度主要关注市场的作用，目前人们普遍认为，当论及私人产品的生产时，一套由私营企业组成的竞争性生产制度具有许多优点。第二个维度主要关注政策制定，当今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都属于某种形式的代议制民主国家。

但上述两个方面留下了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首先，这种共识完全忽略了提供集体产品（collective goods）的生产组织。其次，它没有考虑到设计合理的市场支持制度问题，例如法律制度和监管体系。再者，代议制民主政体也存在许多形式，在选举制度、权力制衡结构和直接民主范围上都可能存在明显差异。

这些挑战的出现，使经济学家或多或少需要扩展自身的专业能力，以保持政策分析中的影响。纵观世界经济问题，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许多问题都与如何为选择好的政策提供激励并确保它们能得到有效实施息息相关。前哈佛经济学家、美国财政部长和世行首席经济学家萨默斯（Larry Summers）强调了这一点，当他最近被问及 20 世纪 90 年代的教训时说：

我想，我们从 90 年代得到的一个最大教训是……制度质量及其密切相关的执政效率问题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性。经过反复论证并得到良好执

行的政策，显然要比拍脑袋想出来且执行得不好的政策更为有效（Summers, 2004）。

经验表明，传统的最优政策分析没有考虑到现存的许多政策问题。首先是寻租和腐败问题。例如，发展中国家怎样有效实施本国的幼稚产业保护政策？即使找到令人信服的理由表明严重的市场失灵能使这类政策达到最优，如何有效实施它们仍然是严峻的考验。

此外，实施问题的重要性还与政策往往需要长期才能见效，而政府不一定能承诺实施一项长期战略有关。这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学问题，因为它还引出了善政府的理念^①。但代议制民主国家的换届选举制度极大地缓和了该问题的严重性，这种推断已经显著影响了人们对中央银行制度这类问题的思考。

但是，解决政府失灵远非我们面临的唯一问题。国家政策能否惠及贫困群体，也是重要问题。例如在现实中，发展中国家的分权化改革——其目的是要提高传统弱势群体获得公共资源的能力——已经成了一项重大的政策难题。

如我们将看到的，新政治经济学通过思考政策设计如何受到制度选择的影响，来回应这一挑战^②。

经济理论的发展也很重要。在 20 世纪 70 年代诸多引人注目的经济理论成果中，对市场不完全信息的开创性研究无疑是其中之一。但研究方向大多侧重于探寻（至少在理论上）市场失灵的各种不同表现。格林沃德和斯蒂格利茨（Greenwald 和 Stiglitz, 1986）运用归谬法证明了不存在任何关于市场效率的客观假定。因此，以市场失灵为理由的政府干预行为似乎并没有限度。但这里的问题在于，纯粹用经济手段替代政府的市场干预措施似乎也不可能。事实上，斯蒂格利茨（1996）早就意识到了这点，他写道：

格林沃德—斯蒂格利茨定理（Greenwald - Stiglitz theorems）不应该被作为政府干预药方的一个主要依据。其中的原因之一是，这样做需要一个更详细正式的政府模型（Stiglitz, 1996，第 33 页）。

新政治经济学正是回应这一挑战的部分尝试。

① 参见 Kydland 和 Prescott（1977）的研究。

② 对制度方法更一般性的讨论，参见 Djankov 等人（2003）。

3. 学科谱系

“政治经济学”这个词虽然可以见诸于很多场合，但所指的研究范畴却大不相同。因此，在更宽泛的历史语境下理解这个词的最新用法不无裨益。这样做也有助于我在本文中更合理地讨论“新”政治经济学的含义。

3.1 古典政治经济学

古典经济学家所用到的政治经济学这一术语和经济学 (economics) 是同义的。19 世纪末，经济学者除了用政治经济学外，开始用到经济学这一术语，最终政治经济学的用法便退出了主流经济学。

古典政治经济学涉及的研究范畴比我们今天所指的经济学要宽泛。但在《国富论》第 5 篇中，亚当·斯密所讨论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却比现代的政治经济学狭窄。他敏锐地意识到有效政府的概念必然要解决政府内部的激励问题。换言之，斯密并没有拘泥于民主制度和经济表现之间的相互作用（考虑到当时的写作背景，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但后来的学者，如亨利·西奇威克 (Henry Sidgwick) 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John Stuart Mill)，却在自己的著作中有意无意地跨越了经济学和政治学之间并不森严的学科界线。

把政治经济学看做一门科学还是一门技艺 (art)，这两者的区别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理念。例如，它构成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1844 / 1948) 对政治经济学定义的论述重点。一方面，穆勒把政治经济学看做一门探求真理的科学，讲述“一个国家应用什么方法实现富国强民” (第 123 页)。另一方面，他把政治经济学看做一门技艺，是成功治理经济的一整套规则，就好比是管好家政的一套诀窍。他写道：

政治经济学的巨大应用意义在于，它可以帮助一个国家成功管理国内经济，犹如精打细算能够给家庭带来财富一样。(Mill, 1844 / 1948, 第 125 页)

在当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父亲约翰·内维尔·凯恩斯 (John Nevill Keynes) 的著作，1891 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和方法》(The Scope and Method of Political Economy)。在该书第 34 页，作者归纳了经济学的三个分支：实证科学 (是什么)、规范科学或规制 (regulative) 科学

(应该是什么) 以及政治经济学技艺, 他把政治经济学技艺视为“准则的阐述”(formulation of precepts)。在谈到穆勒时, 老凯恩斯显然把政治经济学技艺当成了阐述实践准则(practical maxim)的经济学分支。他评论道:

当我们谈到……税收问题, 或涉及国家同贸易和产业之间的关系问题, 或有关共产主义计划和社会主义计划的一般讨论等问题时, 经济上的考虑并不是全部内容。我们还必须考虑伦理、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因素, 而这些都超出了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的研究范围。(第 55 页)

但是在 20 世纪上半叶, 很少有证据表明, 主流经济学家会像这里所描述的那样, 把政治经济学当做一门技艺来研究。尽管如此, 新政治经济学试图“重拾”古典经济学家所设想的政治经济学一门技艺。换言之, 在新政治经济学看来, 实际政策研究的科学性绝不亚于其他经济学分支。

3.2. 比较社会体制

有关比较经济体制的讨论, 尤其是有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相对优缺点的争论, 是继续沿用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的领域之一。政治经济学“标签”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专利。但它在哈耶克和熊彼特等奥地利思想家的著述中也经常出现。

社会主义是一整套社会组织体系, 与经济学和政治学密切相关。因此, 政治经济学的称谓很自然地在关于比较经济体制的争论中被保留了下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体制及其内部的权力关系结构进行了研究, 因为它们对经济学和政治学都有影响。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 尤其是米塞斯和哈耶克, 则更加强调市场配置资源的政治和经济好处。

特别的, 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因素在 20 世纪 30 年代“市场社会主义大辩论”中重又浮现, 并再次引起了主流经济学的关注。兰格和勒纳主张一种能通过社会计划者来复制市场体系的中央计划体制。而这正是哈耶克在其著作《通往奴役之路》中极力批判的地方。但哈耶克最关心的不是善政府问题, 而是社会计划者能否像市场社会主义模式所要求的那样全知全能^①。

^① 参见 Boettke 和 Lopez (2002)。

随着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这些争论成了多姿多彩的经济思想史素材，也逐渐淡出了当代经济学和政治学的视野。但是，新政治经济学确实根源于之前的这一系列争论，而这些争论给政治和经济问题都造成了显著影响^①。

3.3 公共选择

在欧洲大陆，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分离没有英语国家那么明显。尤其是在公共财政领域，法律和政治科学之间的相互渗透仍然较深^②。但只有到了战后时期，随着公共选择理论的产生，这些思想才系统化地融入英语世界的主流经济学。布坎南和塔洛克是公共选择领域的重要开创者，他们于1962年出版的著作《同意的计算》，为合谋及民主管理对税收和公共支出的影响等问题提供了一个里程碑式的分析。

在某些方面，公共选择这一术语被用来指代任何把经济学和政治学联系在一起的分析^③。但我这里的用法要更狭窄，主要是指20世纪50年代弗吉尼亚学派（Virginia School）最早兴起的研究。它具有三个明显的特点。

公共选择分析的第一个重要思想是说明理性的自利行为对政治互动的意义。布坎南写道：

个人必须被模型化为如我们预期或预测的那样只追求狭隘的自身利益，而自身利益被严格定义为可衡量的净财富状况。（Buchanan, 1989, 第20页）

事实上，这种假设并不算标新立异，我们可以在大卫·休谟的著作中找到相似的论述：

在设计任何政府体系，确立宪政制衡机制时，应当把每个人都看成是恶棍，除了不择手段地追求私利外别无他求。因此，我们必须管束他，以防他的贪得无厌和狼子野心危及公共利益。（Hume, 第30页）

① 根据上文所引 John Neville Keynes 的论述，他显然把关于社会主义优点的辩论看做是“政治经济学技艺”论的消亡。

② Musgrav 和 Peacock（1958）编选的优秀论文集使这些研究引起了英语国家的注意。

③ 参见 Mueller（2003）。

对绝大多数经济学家而言，这种说法似乎无伤大雅。毕竟，市场领域中的经济主体作为理性的自利主义者，是人们长期以来已经习以为常的牢固观念。但还存在一个更悠久的历史传统，至少可以上溯至亚里士多德，他意识到人们在追求公共利益时，有可能控制自己的私利。公共选择方法显然忽略了这一点。

公共选择分析的第二个重要思想是，提出了宪政作为自利约束机制的重要性。对此，布坎南论述道：

为了改善政治事务，有必要完善或改革政治博弈的基本规则。改进并不在于选任那些利用其权力谋求公共利益的道德高尚者。（Buchanan, 1989, 第 18 页）

在分析宪政问题时，布坎南从麦迪逊的《联邦党人文集》中获得了许多灵感。换言之，在自利问题上，布坎南和麦迪逊是有矛盾的。事实上，麦迪逊关注的是制度如何能约束自利行为，但他也坚信政治体系的目标是选任“品德高尚者”，也即那些认真对待其受信责任的人。

布坎南区分了宪政设计的两个维度：一个是决定政治参与规则的程序宪政，另一个是直接约束政策选择的财政宪政。

公共选择的第三个重要方面是它的规范框架。经济学家倾向于使用一个特定的（广义功利主义）框架，其中，结果好坏主要取决于对个人效用（作为福利衡量指标）的影响。人们已提出许多权衡这些利弊结果的主张，以测算出“社会福利”值，使分析者能参与有关政策好坏的辩论。但是，公共选择方法植根于一个完全不同的规范传统，可以追溯到 18 世纪人们（特别是约翰·洛克）关于国家的观念。其主要理念是，国家的合法性范围和自由立约的个人愿意接受的程度有关，但也仅此而已。

布坎南无疑是这些理念的坚定拥护者，但第一次把它们运用于具体政策制定（公共支出条款）的则是瑞典经济学家克努特·维克塞尔（Knut Wicksell, 1896）。维克塞尔研究了基于一致性原则的公共供给问题，他发现只要存在受益税（benefit taxation），资源配置将符合契约论目标（contractarian ideal）。这种方法和标准的福利经济学框架略有冲突，后者诉诸某个权威机构（作为社会偏好的监护人）充当资源配置公正的仲裁人。